

养老保险经济学

袁志刚 主编 葛劲峰 封进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养老保险经济学

袁志刚 主编 葛劲峰 封进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老保险经济学/袁志刚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6002-9

I.养... II.袁... III.养老保险-研究-中国
IV.F84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8685号

责任编辑 王 炜

封面设计 许晓峰


美术编辑 王小阳

养老保险经济学

袁志刚 主编

葛劲峰 封进 副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021-63914988)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21,000
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6002-9/F·1347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 | |
|-----|---|
| 001 | 第 1 章 导论 |
| 014 | 第 2 章 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其基本特征 |
| 014 | 2.1 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起源与演变 |
| 018 | 2.2 各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特征 |
| 025 | 第 3 章 养老保险体系起源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讨论 |
| 027 | 3.1 养老保险的效率理论 |
| 033 | 3.2 养老保险的政治理论 |
| 041 | 3.3 养老保险的描述性理论 |
| 047 | 第 4 章 养老保险基本模式的运行机制 |
| 047 | 4.1 养老保险体系的类别 |
| 055 | 4.2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基本特征 |
| 057 | 4.3 现收现付制的运行机制 |
| 061 | 4.4 完全基金制的运行机制 |
| 063 | 4.5 两大体系健康运行的基本前提,以及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比较分析两大体系的优缺点 |
| 068 | 第 5 章 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经济增长 |
| 068 | 5.1 养老保险对储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077 | 5.2 养老保险体系对储蓄影响的经验研究与数值模拟研究 |
| 082 | 5.3 养老保险体系对经济增长与福利的影响 |

| | |
|-----|---|
| 100 | 第 6 章 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宏观经济其他变量 |
| 100 | 6.1 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
| 108 | 6.2 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收入分配效应 |
| 115 | 6.3 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个人资产组合和资本市场运行 |
| 120 | 6.4 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 |
| 130 | 第 7 章 养老保险模式的转轨理论 |
| 130 | 7.1 当前世界养老保险模式的危机:人口结构变动对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的挑战 |
| 135 | 7.2 三支柱养老保险模式的提出 |
| 136 | 7.3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争论 |
| 161 | 第 8 章 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成本分析 |
| 161 | 8.1 控制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与规模 |
| 165 | 8.2 筹集转轨所需资金的途径 |
| 175 | 第 9 章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改革 |
| 175 | 9.1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1951—1990 年) |
| 179 | 9.2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1991 年以后) |
| 185 | 9.3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差异 |
| 195 | 9.4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城乡差异 |
| 204 | 第 10 章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 |
| 204 | 10.1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目标模式的问题 |
| 212 | 10.2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效率分析 |
| 215 | 10.3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面临的挑战——人口结构变动 |
| 219 | 10.4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其他出路 |

| | |
|-----|---|
| 233 | 第 11 章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模拟:劳动力转移、 人口结构与养老保险基金的均衡 |
| 234 | 11.1 基本模型与假定 |
| 241 | 11.2 国内移民速度与人口结构变动 |
| 245 | 11.3 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模拟 |
| 249 | 11.4 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地区差异 |
| 254 | 11.5 政策建议 |
| 258 | 第 12 章 其他养老模式的讨论 |
| 259 | 12.1 家庭养老 |
| 266 | 12.2 农村居民的养老 |
| 268 | 12.3 企业年金 |
| 274 | 12.4 个人养老 |
| 278 | 后记 |

第1章 导论

如何养老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从其产生起,就面临着养老制度的安排问题。在人类的最初状态,由于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类只能采取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只能依靠群体的力量共同生产和消费,每个人的消费水平由原始部落的集体生产力水平决定,与个人的生产能力大小无关,那些因年龄渐长而生产能力不断下降,最后直至无任何生产能力的老人由部落人群共同赡养。这种养老制度在当时也是一种自然和合理的选择。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剩余的出现,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取代了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形态,而人类最初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是与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养老就逐渐由群落集体赡养向家庭内部赡养过渡。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养老的时间最长。一旦采取了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那么,子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种“金融资产”。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在以自给自足家庭小生产为主的社会里,人们在其生命周期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青壮年时,生产能力很大,其生产的产品消费不了,同时假定这些产品无法储存;因此,当人们进入老年时,他们的生产能力逐渐丧失,就没有产品可供他们消费。如果每个家庭都养育一些孩子,将那些青壮年时消费不了的产品“投资”在孩子身上,当他们的孩子成为青壮年时,他们的养老就由他们的孩子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这样的安排来解决养老问题,家庭养老就逐渐成为一种体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谓的“多子多福”事实上就是家庭尽可能多地将未消费的产品储蓄起来,投资在孩子这一特殊“金融产品”上,老年时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回报。孩子多,将来回报也多,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制度。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孝”,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用以保证这样一种金融制度不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家庭养老既是一种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养老制度的安排。当然,由于每个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体的健康与否都是难以控制的,因此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家庭养老也是人类社会对养老问题的自发回答,既是顺其自然的,同时又是一种人为的养老制度的安排。为了避免家庭养老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期望有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出现的思想也很早就有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养老思想可以追溯到《礼记》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当然,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

思想。人类社会真正面临养老制度的安排问题,则是到工业革命以后,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被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大生产,与之相伴随的是大批无任何土地、无任何财产的无产阶级的产生。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生存的惟一经济来源是出售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因此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也就是说没有工资收入时,何以养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因此现代养老保险是以工业文明为背景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则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单位中被逐步建立起来。

养老保险制度是人类的一大创新,它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如何分散家庭风险使所有人老有所养的问题,体现了人类的进步与人类的智慧。但是,世界运行了100多年、中国运行了50多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100多年前养老保险制度推出时,其基本人口年龄结构较为稳定,即当时人口增长较为明显,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人均寿命短期内不存在大幅度提高的趋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开始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人均寿命越来越长,退休后继续生活的时期不断被拉长,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原先以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为主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入不敷出的财务危机,养老保险制度隐含的债务包袱越来越大。

与最早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更为复杂。

首先,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对目前养老保险制度构成更大的威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如同二战后西方世界的“baby boom”时代一样,这部分人口目前开始步入老龄人口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又相继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青壮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开始向发达国家水平不断靠近。以上种种因素,使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提前到来,尤其是在养老保险制度被执行的城市,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面临财务危机,而且这一危机发展的速度可能比这些国家更快。

其次,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是与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相结合的体制如何与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相一致,是目前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转轨是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同时展开

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对这一难题的探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再次,19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增长举世瞩目,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速度迅速提升。在城市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同时,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大量城市郊区的农民正在日益成为失去土地的城市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如何覆盖这些新的城市移民和新的产业工人,正是目前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四,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与此同时,居民储蓄不断地增长和累积,自1995年起全国银行的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说明居民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投资利润率低进而使得存款利率不断下降。为什么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居民消费却相对疲软?为什么居民的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这些问题中,有些与金融体制有关,有些则与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体系的安排有关。因此,如何研究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给出与之相适应的一种养老保险体系的安排,从而促进消费和有效的投资,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最后,经过20多年GDP的高速增长,我们突然意识到GDP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GDP增长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GDP的增长,不断地使我们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简单说来,就是要将GDP增长的好处惠及全体人民,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效率,使各种比例关系协调。因此,当前我们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其中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和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和建设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特有的人口老龄化、特有的经济转轨和特有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难度。

虽然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当前在我国深入研究养老保险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就我国理论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来说,其研究是相当粗糙和相当滞后的。尽管我们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和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是其中往往是描述现象的讨论多,揭示本质问题的讨论少;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讨论很多,但是对养老保险运行机制的讨论很少;对养老保险问题的社会学意义的讨论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经济学意义的讨论较少;对养老保险静态问题的分析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和动态的分析较少;对国外养老保险理论的结论的讨论较多,但是对国外养老保险理论的模型的深入研究较少;对养老保险问题的公平性的讨论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效率性的讨论较少;对养老保险问题的局部

性和片面性讨论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讨论较少。因此,我们对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与上面实践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是滞后的、不充分的,因而难以面对来自实践的挑战。

我们这本书被称之为《养老保险经济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上述来自实践的问题,力图改变当前关于养老保险问题的讨论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制度的刻画、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静态分析和局部讨论的状况,从严谨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学的动态模型,揭示不同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内在机理,深入、全面、综合地讨论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模式——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还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有何意义?这种转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转轨的成本如何消化?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和把握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机制及其模式选择的意义。在对养老保险基本模式的运行机制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在对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入把握上,在对养老保险模式转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转而以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为背景,对中国养老保险的历史变革、当前面临的困境和选择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与分析,以期得出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状态的准确判断,推出在中国选择养老保险基本模式的理论依据,获得有关模式转轨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的结论,从而使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在中国经济取得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基础上,通过较合理地安排养老保险制度,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全民,求得和谐社会在中国的早日建成。

本书由 12 章构成,基本上可以将它们归为 5 个部分。

在本书的第 1 章导论之后,我们将用两章(第 2、3 章)的篇幅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起源和基本特征。第 2 章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描述养老保险的现象:其出现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于 19 世纪末在德国、英国首创,后来又慢慢传递到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较快,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这个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勾勒出不同养老保险体系在资金筹集、给付、管理等方面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特征。第 3 章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对不同的经济学派如何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起源问题进行文献方面的综述。理论的发展总是与实践的演变相辅相成的。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千差万别,在理论上一定会表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我们在给出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保险的有关论述之后,讨论福利经济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对养老保险问题的阐述,着重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加以详细展开,对养老保险的效率理论,我们从风险分摊的

角度、人力资本溢出的角度、退休保险的角度、政府父爱主义的角度、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角度、最优寿命保险的角度、管理成本优势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角度等进行探讨。其次,我们也对养老保险的政治学角度的思考进行了分析,分别从老年人领导政治联盟获胜的角度、“一劳永逸选择”的角度、利益集团博弈的角度对养老保险体系的政治起源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对养老保险的描述性理论进行总结和归纳。

本书的第二部分由第4、5、6三章构成,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养老保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在第4章“养老保险基本模式的运行机制”中,我们首先将世界各国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养老保险体系归结为两大基本模式: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和完全基金制(full-funded)以及这两种模式不同程度的混合制。因此,我们在刻画这两种养老保险模式的基本特征之后,运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年提出并经戴蒙德(Diamond)扩展的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来讨论养老保险基本模式的运行机制。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萨缪尔森在一个储蓄型叠代模型中论证了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体系的运行机制,指出在一个纯粹储蓄型(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经济中,养老金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当人口按 n 速率增长时,每一代人实际上是按 n 比率向上一代人的储蓄支付利息;因此,在一个纯储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来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的增长率。如果我们在模型中加入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来修正萨缪尔森模型,那么,养老金的增长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发展,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从经济学理论界到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决策与政策建议者提出逐步放弃现收现付制,走向从个人积累储蓄基金转向投资获利来保证养老金收益增长的个人基金制,实践中这种模式也得以逐步或完全的推广。

但是,在一个完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中,一个经济的长期资本报酬率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我们借用索洛(Solow)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讨论问题。该模型假定一个产出由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决定的生产函数,生产过程遵循规模报酬不变和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两个要素的价格——利率和工资分别等于它们的边际生产率。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增长为 n ,即 $N_t = N_0(1+n)^t$,如果以每一期人均消费量最大作为长期经济效率最优的标准,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的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

通过推理我们可以证明,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基金制,只要在这两种养老保险体系下,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就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5章“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经济增长”,我们在讨论养老保险两种基本模式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分析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从第3章讨论的结论中我们已经发现,既然两种模式中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两种模式的选择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关键在于两种模式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可以增加或减少储蓄率,从而使储蓄率与经济的黄金律增长所要求的储蓄率相一致。因此,首先我们还是借助于萨缪尔森的叠代模型,分析养老保险两种基本模式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两种养老保险的基本模式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不同的: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贡献一对一地挤出个人储蓄,而基金制对个人储蓄没有影响。但是,事实上养老保险模式对储蓄产生影响的机制非常复杂,上述结论的获得是在许多严格的假定前提下实现的,如果这些假定发生变化,上述结论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在这一章我们还对有关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影响储蓄的经验研究作了介绍,以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其次,我们考虑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把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等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放在一个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在均衡时获得的结论与索洛模型的结论没有区别。由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对储蓄的影响的差异是不确定的,如果现收现付制确实存在对储蓄的“挤出效应”,那么基金制有利于储蓄的增长,但是储蓄的产出弹性有多大,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储蓄是否低于黄金律水平。但是,如果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对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金制通过对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作出有益的贡献。最后,我们考察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我们发现,根据经济增长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养老保险模式可以改善社会福利。

第6章“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宏观经济其他变量”,我们分别考察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中的其他变量:家庭的劳动供给、收入分配、居民资产组合和资本市场运行。养老保险模式的不同选择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首先涉及家庭的退休决策,其次涉及退休前的劳动供给的决策。就家庭的退休决策来说,养老保险模式通过三个途径发挥影响:流动性约束、养老金发放条件的规定和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具有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最优化模型,我们可以证

明,养老保险程度的提高会导致退休年龄的提前。当然在改变某些假定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养老保险水平对退休决策无影响的情况。由此可见,模型的结论取决于模型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是否与现实相符合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也通过收入再分配这个途径讨论了养老保险模式对退休决策的影响,我们发现,一般情况下,收入的再分配即转移支付对接受这个转移支付的劳动者来说,具有诱致提前退体的可能。总之,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倾向于使个人提前退休,这个推理也和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结果相一致。

就退休前的劳动供给决策来说,养老保险模式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类似于收入税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即会扭曲个人的劳动供给,但是这种扭曲的机制是特殊的。由于养老保险存在收入再分配功能,因此对不同的人来说,养老保险的收益率是不一样的,从而产生扭曲性劳动供给的损失也是不一样的。

在第6章中,我们也对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讨论。我们通过对OECD中10个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的比较,发现有些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对代内收入再分配的效率不明显,有些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的“累退”性质较为明显,存在着很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总体而言,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有较强的代内收入再分配功能,再分配是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而实现。与此不同,基金制因为个人的收益与贡献紧密相联,其收入再分配功能几乎就不存在了。

最后我们还在这一章中讨论了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对个人资产组合和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一般说来,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的发放通过代际转移进行,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与资本市场运行相对分离,对个人的资产组合和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就小。

相反,在基金制下,养老金由个人储蓄构成,这部分储蓄又被投资于不同的债券和证券,因而基金制与个人的资产组合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对资本市场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来自于经验的结果证明这一推理的有效性。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养老保险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讨论,由第7章和第8章两章构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压力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国家均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财务困难。许多国家都在寻找一条可以规避不足清偿风险(insolvency risk)和实现体制长期平衡的改革道路,这是每个进行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国家的共同目的。面对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困难,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包括:降低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养老保险税,推迟退休年龄,通过移民或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保持养老保险体系的财政均衡,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等。相对于其他改革方案而言,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是

养老保险体系的“激进改革”。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不仅仅会影响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平衡,而且对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7章为“养老保险模式的转轨理论”。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对有关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争论进行综述,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主张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私人管理和投资的完全基金制。费尔德斯坦认为:第一,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居民储蓄长期低于最优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因此当美国资本积累不充分时,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将高于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和,即高于GDP的增长率。这时,引入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一方面有助于储蓄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能使养老保险基金高于GDP增长率的回报得到实现。第二,由于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本市场相对活跃和健康,体现为资本回报长期高于其他国家,因此长期以来美国成为外国资本引进最多的国家,通过外资的进入来弥补本国资本积累的不足和外贸的逆差。国外资本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保证了美国资本市场在很长时期里的高回报。

但是,以戴蒙德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对上述激进主义的重要论点进行了全面的质疑。事实上,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回报率高于GDP的增长率的前提是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即储蓄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如果一个国家不满足经济动态有效的条件,那么基金的回报不可能长期高于GDP的增长。

即使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回报虽然很高,但是其方差也非常大,表明风险系数很高。同时,养老基金的运行成本要大大高于传统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成本。

由于近年来全世界的储蓄过度,金融资本的数量上升过快,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又过多流向美国,导致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程度增加,虚拟经济脱离实在经济,资本市场的回报没有实在经济作为支撑。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1993年至1999年间,美国大多数养老基金的收益率维持在10%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的GDP增长率;但是到了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很多养老基金损失惨重。200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中,有多达325家公司的养老基金出现资不抵债。

表面上看起来,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可以避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利变化如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问题,但是实际上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仍然没有办法避开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根据宏观经济学中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的一生中储蓄高峰年是在40岁到退休年龄(60岁或65岁)之间,因此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将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储蓄或资本市场的资

产价格。根据某项研究,二次大战后是美国的“baby boom”时代,即出生高峰年,到了1985年,这部分人口相继进入40岁,意味着美国的储蓄出现上升。因此,有经济学家将这一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美国股市的市盈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985年尤其是90年代以后,这部分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由23%逐渐上升到27%,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在这一时期也不断上升。

另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那些已经转向完全基金制的国家,在征收养老保险贡献以后,并没有立即将其用来作为老年人的养老金,而是通过投资经过若干年后才将其作为养老金发放。由此可见,就目前而言,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究竟哪一种体系是较为合理的养老制度安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没有明确的定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但是对这些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8章“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成本分析”,假定转轨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的所有前提都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讨论如何控制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时机和速度的问题,如何估计转轨的成本的问题,以及如何消化转轨成本的问题。

所谓转轨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就是要考察一系列问题:何时启动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转轨,其宏观经济运行的条件如何?不同年龄段的人何时开始过渡到基金制?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如何补偿他们因转轨而带来的显性债务?对这些我们将作较为详细的讨论。一是当转轨的方案确定之后,我们就要将讨论的重点转到转轨成本的分摊上来。何为转轨成本呢?在现收现付制下老年人的养老金是以隐性债务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政府通过向当代年轻人征税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并承诺该期的年轻人将来退休后的养老金支付。但是当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时,当代的年轻人将养老保险贡献转入个人账户,并投资于金融资产,那么该期的老年人的养老金债务就不再由当代年轻人的养老保险贡献支付了,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债券的形式弥补这部分养老金债务。转轨成本也就是转轨所必须支付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现在我们假定,基金制下个人确实获得比现收现付制下较高的养老保险贡献的收益,但是面对新增债务的利息负担,政府必须增加税收以弥补这一开支,那么基金制下所取得的高收益率就被额外增加的税收所抵消。因此如果隐性的养老金债务并没有得到偿付,那么仅仅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险体系实质上的均衡。如果要获得基金制下较高的收益率,就必须在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消化转轨成本,而这必然会使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一代人的福利受到损失。当然在消化了转轨成本之后,以后各代人将获得较高的养老金收益率。因此,如何分摊转轨的成本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我们在这一章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关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讨论,由第9章、第10章和第

11章三章构成。在第9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改革”中,我们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演变及其当前面临的进一步改革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该养老体系在传统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企业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也使这一问题更为严峻。这时养老基金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行。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并在此后几年经历了一个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增加养老保险金来源的阶段。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这一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它要求我们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个人部分积累制过渡。但是,这样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在1997年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第一,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隐含债务由谁承担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此后的所谓个人账户实际上是空账;第二,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年龄结构和老年人口比重差距很大,加上养老基金社会统筹以后,困难企业的养老金交纳有问题,有些省市维持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支付仍有问题,因此确保养老金的发放成了这一阶段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重点;第三,由于中国的人口包袱和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其他目前尚能维持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均衡的地区,在不远的将来也将面临养老基金收支不平衡的严峻挑战。因此,1997年确定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目标模式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实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继续运行至今。自2000年起,我们是否需要开始实际的养老保险体系转轨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目前处于“空账”状态的个人账户是否需要“做实”。2001年国务院决定对辽宁省等地区实行个人账户做实的试点。事实上,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问题上,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没有理清楚,例如,为什么要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均衡?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成本由谁来承担?不同的人承担这一转轨成本对宏

观经济的长期运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上述问题都解决了，并且证明过渡是必需的，那么有没有一个过渡的时机选择问题以及过渡的前提条件准备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分析。

在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体运行情况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又着重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运行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作了考察，利用有关数据作了关于养老保险规模和基金运行对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最后我们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第10章“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中，我们对上述问题试图作出我们的回答。首先，我们对1997年确定的混合制模式中转轨成本的分摊问题进行讨论。在参考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的处理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又对中国特有的通过国有资产减持来补偿转轨成本的方案进行分析和讨论，指出这一方案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众多问题和困境。其次，我们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转轨是否能带来收益的提高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处于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资本收益率长期低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或者GDP的增长率），资本市场又极不规范且风险很大。因此，何时进行现收现付制体系向混合体系的转轨，关键要看中国当时的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何种状态。是国民储蓄不足还是储蓄过度？如果是前者，引进个人账户可以提高国民储蓄，这也是投资的报酬率得到保证的前提条件；如果是后者，引进个人账户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过度储蓄，投资的报酬率难以得到保证。我们认为就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来判断，我们是处于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不高，投资不足，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如果我们加速养老保险体系的转轨，将对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养老保险体系的转轨从长期来看是合理的，但目前从时机上来说不一定是恰当的。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碰到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收支平衡。为此，我们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动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的结果显示，我们的人口结构将由目前的“雪松状”变成2030年的“蘑菇状”。根据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动，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状态改变之前，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完善之前，在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之前，较为现实的做法是寻找其他均衡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收支的方案。因此，我们在第10章还讨论了改变具有一定弹性的参数的问题。在不同的赡养率数值模拟的前提下，我们考察如何改变缴费率和替代率来平衡收支的问题。

因此，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体系内部我们也可以找到在一段时期内获得均衡运行的调节手段，如交纳比例上升、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以及退休年龄的